

目 录

- ✓ 甘孜藏族自治州各县藏汉名称的由来及其历史沿革
..... 来作中 江安西 邓珠娜姆 书刚 (1)
- 为西藏和平解放献身的甘孜格达活佛
..... 邓珠娜姆等提供资料 来作中执笔 (11)
- 甘孜孔萨土司家族的由来、世系及其兴衰经过
..... 松吉邓米口述 郎加 书刚翻译搜集 来作中整理 (18)
- 从“大白事件”到“岗拖协议”
..... 来作中 书刚搜集整理 (31)
- 川康二旅“康定兵变”纪实
..... 兰文品 (40)
- 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斗
..... 白马邓登
夏克泽郎口述 郎加 书刚翻译记录 来作中整理 (44)
- 炉霍政教合一的大祈祷法会
..... 郎加 泽呷提供资料 来作中整理 (62)
- 石渠县温波喇嘛寺叛乱经过
..... 土热 (101)

甘孜藏族自治州各县

藏汉名称的由来及其历史沿革

来作中 江安西 邓珠拉姆 韦刚

康区，是康、藏、卫三区之一部，古称“喀木”。其疆界东起二郎山，西至丹达山，南邻云南，北接甘青，包括今之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设治时间，据有关史书记载：汉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九十七年），于边外（今泸定以西）设都尉，建沈黎郡（包括今汉源、泸定、九龙一带）；魏晋南北朝时，属蜀郡、益州；唐时设羁縻州，开始实行土司制度；清初属四川管辖；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〇年）设打箭炉厅，隶雅州府（今雅安）。

清朝末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康区“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设置流官统治），收缴了历代封建皇帝敕封给当地土司（宣慰司、招讨司、宣抚司、长官司等）、呼图克图（圣者之意，是皇帝对极少数高僧敕封的崇高地位和称号）的印信号纸，先后奏请在当地设立了康安、边北两道，康定、巴安、邓科三府，甘孜、白玉、德格三州，三坝、理塘两厅，盐井、定乡、稻城、河口、石渠、同普六县，乍丫、昌都两理事官，得荣、江卡、贡觉、桑昂、桑瑜、三岩、章谷、道坞、瞻对、泸定、硕般多、达威等十二个设治委员。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傅嵩林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奏请建立西康行省，定巴塘为省会，修建公署。后武昌事起，宣统让位，建省之议，未成事实。

民国初年，改上述地区为川边特别区，裁撤府、厅、州、理事官、设治委员，统一县治。以后，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帝国主义的挑唆下，不断发起东侵，占据了金沙江以西和金沙江以东的新龙、德格、甘孜地界。一九二八年九月，国民党中央通过决议，将康区改建西康行省，设立“西康政务委员会。”一九三二年十月，刘文辉和达赖派谈判委员在岗拖举行谈判会议，签订了以金沙江为界，分驻藏汉军队的六条协议（即岗拖协议）。至此，在康区原来所属的三十三个县中，金沙江以西的十四个县，实际上已为西藏地方政府所控制。一九三五年二月，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一九三九年一月，建立西康行省，定康定为省会。

一九五〇年三月，康定解放，十月，又解放了昌都，十一月，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以康定为首府组建成立了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嗣后，中央又以昌都为中心，成立了昌都解放委员会。至此，原来康区所辖的县，分别归由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和昌都解放委员会领导。一九五五年三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更名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同年十月，西康并入四川省，原西康省藏族自治州也更名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辖二十一个县。一九七八年撤销邓柯、义敦、乾宁三县，分别并入石渠、德格、巴塘、理塘、道孚、雅江等县。现甘孜藏族自治州共辖十八个县，总面积十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一平方公里，人口七十二万九千一百四十人（一九八二年六月人口普查统计数字），有藏、汉、彝、回、纳西、苗、羌等民族，其中藏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三。

现将甘孜藏族自治州各县藏汉名称的由来及其历史沿革简介如下：

康定：县城是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也是全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距成都三百六十六公里，旧名打箭炉。

关于打箭炉名称的由来，有多种传说。一说是诸葛武侯南征孟获时，曾命大将郭达在康定安炉造箭，因而得名。但对这一传

说，历来有不同的见解。理由是诸葛亮南征时，并未经过康定，史书上也未查到有关郭达其人的记载。康定虽有所谓的“郭达将军庙”，但所供神像是藏系佛教的护法神当钦(དམ་ཅན)。传说中的“当钦”，铁匠出身，坐下骑羊，手持皮火筒(藏族烧篝火时的一种燃工具)，为藏族铁工供奉的神像，喇嘛教称之为“骑羊护法”，与郭达无任何联系。另一说法是，诸葛亮南征时，为解除后顾之忧，曾商请康区酋长让给“一箭之地”，并在郭达山顶插箭为凭，作为藏汉交界处所。这一说法，也无史籍可考。第三种说法是，藏语称康定为“打折堵”(དར་རྩ་པུ)意为“打曲”(汉名为雅拉河，因是从藏名称为“达布拉”(ད་པུ)汉名称为大炮山山脚下流出来的，故称为“打曲”)和“折曲”(汉名为折多河，因是从藏名称为“结妥”(ཇུ་པུ)汉名称为折多山脚下流出来的，故称为“折曲”)二水相汇的地方。还有一种说法是，打折堵的“打”(དར)字，意译为旗，“折”(རྩ)字意译为尖，“打折堵”合译，为“旗尖的交叉口”，这一译法又符合喇嘛教对康定环城的郭达山、跑马山、阿里布果山分别称之为密宗事部三怙主(སྲིད་སྲུང་གསུམ་མཛོད་པོ)：金刚部金刚手(郭达山)、莲花部观音(跑马山)、佛部文殊(阿里布果山)神山及其山颠均竖有“嘛里旗”、而康定又位于三山交叉之口的解释。后两种传说，都有一定道理，应以何说为准，尚有待进一步考证、研究。

关于康定的设治，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康定属牦牛县管辖；唐时置土司统治；元朝隶属青海；明成祖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康定土司阿旺坚赞因随征有功，册封为明正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在当地建碉设市；清雍正年间，在此设打箭炉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改打箭炉厅为康定府；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废府设县；一九三九年一月伪西康省政府成立，设省会于此；一九五五年随西康省建制的撤销，复划归四川。

泸定：位于康定以东，距康定四十九公里，大渡河纵贯全

境。因大渡河又名泸水，故取名泸定。藏语因此地为山谷地带，称为“阿壘(ང་ལུང་)，汉译为“安乐”。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一七〇六年)在大渡河上架设了巨型铁索桥，藏语又称之为“甲桑卡”(ལྷག་ལ་བམ་ཁ།)，意为铁索桥畔。据记载，泸定在晋代属晋乐县，唐属大渡县，明清年间，是沈边土司(据记载其始祖为江西吉安人，明洪武年间，随征有功，被授为沈边长官司)、冷边土司(据传其始祖是藏族瓦述部落酋长，明成祖永乐八年，即公元一四一〇年，被授为冷边长官司，迁来此地)、咱里土司、化林坪土司(其始祖原为明正宣慰司之守备，以随征有功，于清乾隆十年，即公元一七四五年被册封为理塘宣抚司，乾隆十二年，改任理塘额外副宣抚司，二十二年，又移住化林坪为土司)驻地。历设巡检，隶属打箭炉厅，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设委员治理，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改县至今。

雅江：位于康定以西，距康定一百四十八公里。藏语称其地为“娘区卡”(ཉལ་ཁུ་ཁ།)，即雅砻江畔之意，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一七一九年)在此设渡口，汉语称之为“中渡”。雍正四年(公元一七二六年)，在此设外委一员，率兵镇守。光绪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改流时，划东部明正土司辖地和西部理塘瓦述崇喜土司辖地，设河口县，隶属康定府。民国二年改称雅江县至今。

九龙：位于康定西南，距康定二百五十二公里，历史上为明正土司辖地。因当地有一结素寺，藏语即以寺命名，称为“结素”(ཉལ་སུ་མེད།)。汉语则因其地有菩萨龙、三岩龙、雪洼龙、麦地龙、三丫龙、八窝龙、速窝龙、洪坝龙、湾坝龙(藏语“龙”ལུང་为山谷的意思)之称，故称为九龙。清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改流设九龙设治局，隶属康定府。民国元年设县至今。

九龙县除藏、汉民族外，还有百分之四十四的彝族。盖因早在一七八〇年前后，凉山喜德县境内，有兄弟二人，不堪奴隶主和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歧视压迫，迁居到九龙谋生，以后逐渐增迁新

户和子孙繁衍，达到了现有人数，占据了大片土地。

丹巴：位于康定以北，距康定二百二十五公里。该县地处高山峡谷，藏语称其地为绒麦章古(རེང་མེང་གཞུ་རྩེ་གོ)，意为山岩上的城。汉名根据当地有丹东、巴旺、巴底土司，称之为丹巴。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改流置设治委员，后改县，隶属康定府。

道孚：位于康定西北方向，距康定二百二十公里。历为康定明正土司及丹巴革什扎、瓦述鱼科、霍尔孔萨、麻书、章谷六土司交界之地。藏语称其地为“大巫”(ཤེ)，意为当地地形如马驹。汉语根据译音称为道坞。清雍正四年(公元一七二六年)设果洛汛，置把总一员于此。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改流置道坞委员，民国元年称道孚县至今。

理塘：位于雅江以西，距康定二百五十八公里。因其地以宽广的毛垭坝为主，藏语称之为勒塘(ལེ་ཐང)，意为铜镜似的草原。汉语根据译音称为里塘。元至元二十五年(公元一二八八年)设里塘钱粮总管府，明称里塘部，清初一度改名顺化，雍正时设里塘粮台，后改称里塘军粮府，分别置僧俗营官(俗营官即正土司，僧营官为副土司)和汉族粮务(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外委(二员)共同管理。光绪三十二年(公元一九〇六年)改流，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设理化厅同知。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改为理化府。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易里为理，改称理化府。一九一四年度府设县。因理化有同化、强化的意思，解放后于一九五一年恢复理塘名称。

巴塘：位于理塘以西，距康定四百八十三公里。汉时为白狼羌驻地，与西藏、云南隔金沙江为界。

巴塘名称的由来，据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人牵着驮干粮的羊子，到处寻找安身立命之地，到了巴塘看到那里气候温和，地沃草肥，决定留住下来。这时，恰遇羊子吼叫，于是以羊子的叫声为寓意，取名巴塘(འབྲུ་ཐང)，即羊子叫唤的坝子。汉语根据译

音，称为巴塘。

巴塘早在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五十八年至七十四年）即同内地有较多的往来。为川、滇、藏商聚集经商之地，是康南经济文化中心。元世祖（公元一二六〇～一二九三年）时，在巴塘置招讨司，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一七一九年），巴塘土司扎什彭措（བཀྲ་ཤིས་ཕུན་ཚོགས）随征有功，册封为宣慰司。乾隆十三年（公元一七四八年），在巴塘置都司、千总、把总各一员和粮务委员。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改流，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设巴安府。康安道也驻于此。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废府改县。解放后，于一九五一年复改称为巴塘县。

稻城：位于理塘之南，距康定四百三十二公里，历为理塘土司辖地。藏语称其地为稻坝（འདྲུག་པོ་ལུང་།），“稻”（འདྲུག）在藏语中为沟尾的意思，是山谷夹溪的地方，“稻坝”意为山谷沟口之地。汉语根据译音称为稻坝。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改流，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置稻坝委员，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设稻城县，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复将曾于光绪三十四年设置的贡噶岭县丞并入至今。

乡城：位于稻城以西，距康定四百八十八公里，历为理塘土司辖地，由于该地有硕曲与定曲流经全境，沿河两岸都是相对称的村寨，故藏语称其地为“卡称”（མཁའ་མཚོ།），汉语据其译音，又根据乡城所在地有桑披喇嘛寺，院墙高垒，俨然城廓，故称之为乡城。

据记载，乡城在元、明时期，即已设官治理。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一九〇六年），乡城桑披寺僧众叛乱，旋被平息，实行改土归流，设县置官，取名“定乡”，隶属巴安府，一九五一年，复根据藏语译音，改称乡城。

得荣：位于乡城以西，隔金沙江与云南相望，距康定六百三十五公里，境内气候温和，适宜农作。藏语称其地为“得绒”（ལྷོ་རྩེ།），意为地势较低的农区。历为巴塘土司辖地。清宣统三年

(公元一九一一年)设得荣委员,民国元年改县。汉语根据藏语译音,称得荣县。

炉霍: 位于道孚以西,距康定二百九十一公里。据传因当地土司系蒙古族后代,故藏语称其地为霍尔章谷(ཧོར་གྲག་རྩ་གུ་),意为霍尔章谷土司的官寨在此地的岩头上。汉语根据藏语译音,称为章谷。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章谷土司绝嗣,清政府置委员管理。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设炉霍屯(一说是因治所为炉水和霍水汇流之处,一说是因其地为打箭炉至霍尔五部及西藏的必经要道,故称为炉霍),隶属打箭炉厅。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改县至今。

色达: 位于炉霍以北,距康定四百四十四公里。藏语称其地为“瓦述色达”(ཨ་གུལ་གཞེན་ཐང་ 瓦述,是散居在青康交界牧区中藏族十八述氏家族之一部,据说是因为历史上曾在这里发现过一块马形的黄金而得的名称,也有称之为金马草原的)。长期为部落制,清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改流设达威县,置委员。辛亥革命后,又恢复部落统治。解放后于一九五二年建立色达办事处,一九五五年设县至今。

甘孜: 位于炉霍西北部,距康定三百八十三公里。藏语称其地为“甘思”(དགའ་མཚོ་གཞིན་མོ་),一说其意为白色而美丽的城;另说是甘孜寺建寺在白色石头的地基上;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康区建立十三所黄教寺庙的第一所寺庙~甘孜寺时,曾择定吉日,举行开基典礼,因而称当地为甘珍(གཞིན་མོ་གཞིན་མོ་)。汉语根据译音,称为甘孜。

据史书记载,甘孜土司制度始于唐贞观(公元六二七~六四九年)年间,原因是唐文成公主入聘西藏时,甘孜酋长昂旺(འགྲོ་འཕེན་)护从迎亲大臣禄东赞(ལལ་ལྷན་དཔལ་ལོ་)有功,被唐王封为甘孜土司,后固始汗征服康藏,封其王子七人于甘孜、炉霍等地,称为“霍尔七部”(清末尚存五部)。清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赵尔丰在甘孜改土归流,设甘孜委员。民国元年(公元一

九一二年)改甘孜州,二年,复改县至今。

新龙:位于甘孜以南,距康定四百九十五公里。地处雅鲁江两岸,因气候温和,森林茂密,宜于农作物生长,藏语称其地为“拉绒”(ལྷག་རིང་)、“娘绒”(ཉག་རིང་)。明洪武六年(公元一三七三年),册封当地头人五名为上、中、下瞻对土司。清雍正四年(公元一七二六年)藏军曾一度割据瞻对,至光绪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退出。因当地民风骠悍,又多次发生过变乱,清宣统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赵尔丰在当地实行改土归流,曾奏请改称怀柔县。后因县名重复,又改称瞻化,设委员,隶属邓柯府。民国三年改县,一九〇五年新龙解放后,根据当地有“主磨宗”(རལུག་མ་རྫོང་ 其中“主磨”是母龙的意思)、“主沙宗”(རལུག་གསར་རྫོང་ 主沙即新龙的意思)地名的译意,改称新龙县。

德格:位于甘孜以西,距康定五百八十八公里。德格名称的由来,据传,德格土司家族第二十九代的四郎仁青,曾担任过西藏喇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第一代萨迦法王八思巴·洛追降村(འཕྲོ་མགོ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བྱེད་ཐུལ་མཚན་)的“色斑”(གསོལ་དཔེན་ 即膳食堪布,负责掌管法王的饮食),法王称他具有“四德”(指佛教中的法、财、欲、解脱等“四部”)、“十格”(指种地、造屋的善土,筑墙、制磨的善石,行船、止渴的善水,建房、作薪的善木,放牧、饲畜的善草,以上土、石、水、木、草各占二格,合为“十格”)的品质和福分,以后四郎仁青即以德格作为自己家族的族名。地名也随德格家族的名称而称为德格(ཤེ་དགེ་),清宣统元年(公元一九〇九年)改流,设德化州,隶属邓柯府。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恢复德格名称,设县至今。

白玉:位于德格以南,距康定六百二十二公里。藏语称其地为“白玉”(དཔལ་ལྷན་),意为吉祥兴隆之地,历为德格土司所辖。明洪武六年(公元一三七三年),册封当地头人降德为千户。清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改流设白玉州,隶属巴安府。民国二

年（公元一九一三年），改县至今。

石渠：位于德格以北，距康定六百五十九公里。因地处雅鲁江上游，藏语称其地为杂曲（ཇ་རུ）或杂曲卡（ཇ་རུ་ཀ་，意为杂曲的两岸）也称色须（སེ་ལུ་），其意是石渠有一座较大的寺庙，系西藏色拉寺喇嘛呷举罗绒邓登所建，称为色须寺。色须寺所在的地方，称为色须。居住在那里的部落，称为色须部落。汉语根据色须藏名的译音，称为石渠，为一游牧地区，历属德格土司管辖。清宣统元年（公元一九〇九年）改流设县，隶属邓柯府。

此外，一九七八年撤并的邓柯、义敦、乾宁三县，其名称来源和历史沿革分别是：

邓柯：位于德格以北，距康定六百四十一公里。藏名为邓柯（འདན་ཁོ་），意为藏族古代英雄格萨尔下属四大部将之一的邓马（འདན་མ་）出生的地方。历为德格土司和春科、高日、灵葱土司的领地。据记载，邓柯汉时是羌族部落，唐时为吐蕃吞并，元时为朵甘思（མདོ་ཁམས་）营军万户府所在地，明设朵甘（མདོ་ཁམས་）卫。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赵尔丰在邓柯改土归流后，于宣统元年（公元一九〇九年）在此设边北道邓柯府。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改府为县。一九七八年撤县，其地界分别并入石渠、德格两县。

义敦：位于理塘、巴塘之间，距康定四百零五公里。藏语称其地为岭呷西（ལིང་ལྷ་མེས་）或岭卡西（ལིང་ཀ་མེས་）。据传，这里是藏族古代英雄岭格萨尔王所辖地区，并有格萨尔王的叔父掘通（མ་པལ་ཐུང་）在这里建筑的碉房一座，因而得名。汉语译为岭卡石。历为理塘、巴塘两土司的领地。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改流后，在此设三坝厅，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改称义敦，设县。一九七八年撤县，其地界分别并入巴塘、理塘两县。

乾宁：位于康定西北，距康定一百三十八公里，古称噶达（མགར་ཐང་），意为禄东赞（མགར་དམ་པ་ 藏语称噶当巴）在为藏王松赞

干布(མོ་བཀའ་ལྷན་པོ་)迎娶唐文成公主以后，被作为人质留居长安。后以朝神山为名，到了这里，摆脱了唐王的控制，逃往西藏地方。清雍正六年(公元一七二八年)，在这里为七世达赖修建的惠远寺落成，改噶达为泰宁(亦称泰凝)，清宣统三年改流以后，归道孚管辖。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改设泰宁实验区，后改为设治局。同时，刘文辉用他“自乾”的名号，改泰宁为乾宁。民国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四五年)设乾宁县。一九七八年撤县后，其地界分别并入道孚、雅江、丹巴三县。

一九八三年四月

为西藏和平解放献身的甘孜格达活佛

邓珠拉姆等提供资料 朱作中执笔

今年藏历七月十二日（公历为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是原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格达活佛为西藏和平解放献身三十周年的忌日。

在我们即将热烈庆祝建州三十周年时，对于曾任中华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副主席，以实际行动支援过红军；在红军离开甘孜后，又甘冒风险，掩护转移红军伤病员，抢救红军伤残战士；为和平解放西藏而英勇献身的格达活佛，特别表示深切的怀念。

（一）

格达活佛，法名格桑登真·扎巴他耶。一九〇二年生于甘孜县白利乡德西底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七岁时被定为甘孜白利喇嘛寺活佛，后即移居甘孜白利喇嘛寺。十七岁去西藏拉萨噶丹寺学经，八年后获格西（在僧众大会中辩论佛教经籍考取的学位名号）学位，是一个格鲁巴（黄教）教派虔诚的信徒。由于他自幼曾在农民群众中生活，因而他生活俭朴，对劳动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常将寺庙所得布施拿出来周济穷人。他又懂藏医，经常为附近贫苦农牧民看病施药，他还编写了大量本民族的锅庄歌词，其中一部份至今尚在群众中广为流传，为传播藏族人民的文化作出了一定贡献。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剥削、歧视藏族人民，实

行大汉族主义统治的法西斯行径无比愤慨。他所主持的白利喇嘛寺，经常收容有二、三十个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孤儿和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出走的劳动人民，因而藏族人民都非常爱戴他，称他“真正是‘普渡众生’、‘慈悲为本’的活佛”。

(二)

一九三五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惊中外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经过藏区，国民党反动派勾结藏区的反动喇嘛和土司头人组织反动武装，企图阻扰红军北上。同时对共产党和红军大肆进行造谣诬蔑，通告群众不准卖粮食给红军，不准给红军带路、当通司（翻译），胁迫群众逃离家乡上山隐藏，妄图置红军于绝境。这时格达活佛派人探听了红军的动向，听了红军的宣传，在红军到达甘孜后亲眼看到红军广大指战员模范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藏民风俗习惯，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寺庙，不扰害百姓的实际行动，深为叹服，他判定红军确实是一支能够解放劳动人民脱离苦海得到幸福的军队，是藏族人民的好朋友、大救星，因而决心靠近红军，并将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向群众广为宣传，说服群众不要听信谣言，要各自安居乐业。在他的宣传影响和带动下，不少藏族同胞消除了顾虑，纷纷返回家园。这时，格达活佛又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为红军筹备粮草，响应红军号召，反对国民党官僚军阀和反动土司头人的压迫剥削，组织藏族人民自己的人民革命政府。他受到朱德总司令亲切的接见，并积极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的筹建工作。

一九三六年六月，在甘孜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的成立大会，朱德总司令亲自参加了大会并讲了话。格达活佛在会上被选为甘孜博巴政府副主席，也讲了话，他号召藏民团结起来搞好生产，支援红军，制止内战，一致抗日。会后，他又派遣自己寺内的喇嘛到各处向群众宣传红军和博巴政府的政策，张贴

宣传告示，打听敌人消息。召回村民生产，动员群众筹备粮食支援红军。仅白利寺就支援红军粮食青稞三万多斤，豌豆四千多斤。对此，红军专门派负责干部向格达活佛表示了深切谢意。

在红军的密切接触中，格达活佛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纲领、前途有了进一步认识，进而受到了更为深刻的鼓舞和教育。

他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红军和中央军反复进行了对比，认识到：国民党的官吏和军队，一到藏区就是压迫剥削歧视打击藏族人民，他们的苛捐杂税和乌拉差役多如牛毛，压得藏族人民喘不过气来；而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则是严格执行民族、宗教政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公买公卖，不住寺庙，不住民房，不派乌拉差役，不打人，不骂人，还把藏族人民当作红军的朋友。对比之下，更加坚定了他永远相信共产党，愿意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红军决定北上抗日离开甘孜前夕，格达活佛更加积极为红军筹备粮食、帐篷、皮火筒等物，亲自到附近一些寺庙去商量如何安置保护红军伤病员的问题。当红军离开甘孜时，朱德总司令曾亲自向格达活佛告别。对他说：我们要北上抗日去了，你们留在这里要很好地团结起来，把博巴政府办好。只要团结得好，就能够战胜一切凶恶的敌人。红军至多十年、十五年是一定要转来的。朱德总司令的这番话，使格达活佛深受鼓舞，对他以后坚持斗争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自己决心铭记朱德总司令的教导，坚持斗争，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光明温暖的春天的到来。

红军走后，格达活佛时常怀念共产党和红军，他把红军保护寺庙的布告和文件隐藏起来，并时刻为红军顺利到达目的地而进行祈祷，还继续经常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坚定地相信并鼓励群众：红军总有重回甘孜的一天，藏族人民也总有翻身解放的一天。这就增强了群众对红军的信赖和希望。

红军离开甘孜后的第二天，甘孜喇嘛寺反动喇嘛生龙多吉一

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下，公开杀害了甘孜博巴政府的组成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四十多人，还有的被挖去双眼，有的财产被抢劫一空。格达活佛对此极为震惊，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甘孜寺进行劝阻，同时把没有受到伤害的红军重伤病员接到自己的喇嘛寺居住，并把轻伤病员作了转移。一些重伤病员经过格达活佛一个多月的精心调理治疗，绝大部份的伤病员得到了恢复和好转，先后有二百多名由格达活佛亲自派人安全送出藏区。

格达活佛不仅积极保护红军伤病员，而且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利诱，始终没有屈服。当国民党一个中央监察委员动员他和红军切断联系参加国民党时，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后来格达活佛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纠缠和迫害，带着甘孜博巴政府的印章、文件，到西藏拉萨避难。

在拉萨期间，格达活佛对红军仍十分怀念，他把自己珍藏的一张朱总司令的照片，供在佛堂里，经常为朱总司令念经祝福，为红军祈祷平安。并经常打听红军的胜利消息，向拉萨的友好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一直在拉萨住了十年。

(三)

一九四九年，青海、甘肃两省相继解放，消息传来，格达活佛极为高兴，当即派出代表，穿过敌人的严密封锁，从青海绕道北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汇报红军走后藏民遭受的灾难，并代表甘孜地区人民，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致敬，希望早日解放康藏。当人民解放军解放康定后，格达活佛在甘孜亲自主持召开了三千多人的群众大会，欢庆解放，并派代表带上礼物和亲笔信到康定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他的代表得到苗逢澍政委要他进一步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准备迎接解放军，并为和平解放西藏贡献力量的指示时，格达活佛积极向当地人民进行了宣传，为大军进藏准备了很多粮食。解放军到达甘孜时，格达活佛以无比激动的

心情，和当年留下的红军以及当地人民群众，亲自跑到十里以外的地方，热烈欢迎当年的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

解放军到达后，格达活佛先后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等职。当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要在北京召开时，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发来电报，请格达活佛去北京开会，这时他多么想见到日夜想念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啊！可是当他看到帝国主义和西藏一小撮反动份子一直阻扰西藏当局派代表去北京进行和平谈判时，心里十分气愤。他想：西藏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藏族是中国境内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在伟大祖国的发展过程中，西藏各族人民同样尽了自己的一份光荣的职责。但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同样也侵入了西藏地区，他们还进行了各种欺骗和挑拨。国民党反动政府对西藏各族人民，则和以前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不断行使民族压迫政策，致使西藏内部发生了分裂和不团结。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少数顽固派，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挑拨离间，不仅没有反对，而且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这就会使西藏各族人民陷于被奴役和痛苦的深渊。他想到这里，决心不辞辛劳，亲自前往拉萨向西藏政府晓以大义，陈说利害，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贡献。他向甘孜党委、政府和亲友们说：我是十分希望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但是目前西藏尚未获得解放，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还没有解决，我必须先到西藏去，向有关人士讲明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说服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等到西藏和平解放了，我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对此，地方党委和人民解放军的首长以及他的亲友，对他去拉萨可能会遇到危险，都表示关心和耽心，但是他说：我相信西藏地方政府会深明大义的，为了祖国的统一团结，为了西藏各民族的彻底解放，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一九五〇年七月四日，他谢绝了各方面的劝阻，毅然离开甘孜，前往昌都。临离开甘孜前夕，甘孜及白利寺地方僧众，举行了盛大的舞会，对格达

活佛表示欢送，并在沿途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一九五〇年藏历七月初五（公历八月五日），在广大僧众的护送下，格达活佛安全到达昌都。

（四）

格达活佛到达昌都后，不怕旅途劳累，立即四处奔走，向昌都地方当局和各族各界人士苦口婆心地宣传讲解《共同纲领》和党的方针政策，受到了当地绝大多数上层人士和僧俗群众的热烈拥护。但这一行动也引起昌都地方当局中个别反动分子、特别是英帝国主义特务分子福特等人的恐惧，他们竭力阻扰格达活佛的正义行动，要挟昌都有关部门不给格达活佛办理去拉萨的通行证明。对此，格达活佛泰然置之，并决心打电报同拉萨当局直接进行谈判。但因当时昌都电台仍然为英帝国主义分子福特所控制，福特即利用格达活佛去电报局发电的时机，假献殷勤，在茶里放了毒药，向格达活佛下了毒手，格达活佛被害身死。死后因中毒全身乌黑，在昌都进行了火化，这时格达活佛年仅四十八岁。毒害格达活佛的英帝国主义分子福特，在我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时被俘获，受到了应有的惩治。

格达活佛遇难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藏族地区，广大藏族人民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后，悲痛万分，纷纷举行追悼会。西康省人民政府专门发布讣告，肯定了格达活佛是藏族人民中最优秀杰出的人物之一，深受广大同胞的爱戴，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他的死，是为了祖国统一和广大藏族人民的翻身解放而死的，是死得其所，虽死犹荣。同时他是被帝国主义分子勾结西藏反动分子残害而死的，这就使广大藏族同胞更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个别坚持反动立场分子的罪恶嘴脸，进而更加坚定了藏汉民族亲密团结，誓把帝国主义势力驱出西藏的信心和决心。毛主席还把亲笔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锦旗，连